

作家章小东：人不能跌进钞票这个洞

◆ 楼乘震

在作家这个圈子里，有一群特殊的女性，她们生活在异国他乡，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，依然笔耕不辍。她们中，早先有林海音、聂华苓等写过多部脍炙人口名著的女作家；现在的代表则有严歌苓、虹影等人。2012年，因为写作《火烧经》，这个名单上又多了一位章小东。

6月初，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在香港中大书店见有章小东的新作《吃饭》，立即买下并打电话告诉她姐姐章洁思，等小东回上海要请她签名。8月中旬的一个大早，章洁思就来电告知妹妹回来了——《吃饭》已在内地出版，她应邀来参加上海书展。于是，记者不顾38.4摄氏度的高温到了章家，小东忙着拿冰水，又搬来电扇放在记者背后，细心得如同多年老友。

为什么这么恨土豆烧牛肉？

章小东祖籍天津，父亲靳以是著名文人，鲁迅先生的扶拯人之一，也是巴金、曹禺的好友，主持过多种文学刊物，与巴金共同创办了《收获》。母亲陶肃琼是巴金夫人萧珊的中学同学、密友。

可即便出自这样的门第，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。1959年靳以去世时，章小东才3岁，姐姐章洁思也才15岁。我记得章洁思曾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父亲下葬的场景：“3岁的妹妹是如此无助，她瘦弱的小手紧紧牵着身边人的衣服，仿佛一放手就会跌入深渊。大病后步履困难的我，披着麻衣穿着孝服，在别人的搀扶下弯着身，在寒风中为父亲的

墓铲上那最后一抔土……”

父亲去世后，家道中落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章小东曾对着一小盘卷心菜根难以下咽，那是保姆从菜场捡来的，煮熟后就撒了两粒粗盐。正苦恼时，听到无线电里一男一女两个义愤填膺的声音正在批评苏联赫鲁晓夫“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”的讲话，他们说这是修正主义。章小东嘟囔了一声：“为什么这么恨土豆烧牛肉？我喜欢土豆烧牛肉，我喜欢修正主义。”母亲听见，惊慌地跑来：“不许瞎讲，小小的人，当心吃官司。”

十年“文革”让章小东一家坠入地狱，但家学传统一直深深烙印在章小东的心里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是一代人改变命运的良机，章小东因为父亲的缘故，报考了复旦中文系（靳以曾在那里执教），“我只填了这个志愿。我的成绩很好，但在‘文革’期间没插队落户，属于‘不服从组织分配’，不得进入一类大学。最后只能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。”报名时，章小东的心情糟透了，随便找了个桌子填表，结果竟糊里糊涂读了俄语。

毕业分配工作时也“很好笑”，竟然让章小东教英语。没办法，她只好每天回家问姐姐，自己又去进修，边学边教。工作之余，她开始在《十月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散文，后来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，还考入复旦新闻系。

吃饭如此美妙 又如此残酷

章小东没有在新闻行业一展拳脚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她随夫去了

美国，但她与自己的文学故乡并没有中断联系。

初到美国，她在一家华人周刊当记者、编辑和排版。5年以后，她学会了电脑技术，接着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了10年。这份工作看来与文学关系不大，但章小东一直在悄悄地用功，后来，她索性辞职，当起了“坐家”（作家）。

《吃饭》是章小东在美国生活的凝练。读者可以发现，章小东绝对不是一位温和的作者，即便是舒缓的日常生活，她也可以揭示出其中的残酷。正如评论者所说：“吃饭，如此美妙，又如此残酷。”

书的名字，其实来自于章小东母亲的话。“临来美国前，母亲固执地把一件件做飯家伙和调料塞进我已经超重的箱子，脸上呈现的是生离死别的悲哀。她说：‘出门在外，最要紧的是吃饭。凡是可以和你一起吃饭的人，就会是你的朋友。假如连中国饭也不接受，就不会是你这个中国人的朋友！’”

现在回忆起来，章小东说：“小时候，母亲老逼我背‘民以食为天’，这很拗口，但生活不断告诉我，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事。这也是我在《吃饭》里想要陈述的。”

在章小东笔下出现的一个个关于吃饭的故事，有他们一家，也有亲朋好友，或温暖、或残忍、或凄凉。章小东很有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秉笔直书的气概，生活在她笔下显出原形，“如何吃饭”本质上就是如何活着的问题。在她的书中，上至商人富贾、文化名流，下至卖身的男妓、没有身份的“黑人”，用自己各式各样的遭

际回答着这个问题。

作家阎连科这样评价《吃饭》：“阅读章小东的《吃饭》，总让人想起余华的《活着》。《活着》为了活着而不断地死去；而《吃饭》是为了吃饭才活着。这不是一部虚构的缥缈之书，而是我们民族人人记忆散片的黑色花朵，其真实让人不寒而栗。”然而，在章小东的笔下，吃饭还有另一个意义——与家和希望密切相关。因此，《吃饭》虽然写了人寻找饭吃所必须面对的残酷和荒诞，它真正的主题仍是家庭和希望。

饭碗寻到了 味道没有了

如今，章小东定居美国费城附近的斯沃斯莫尔，家中如同“中国文化中心”，常常高朋满座，最多同时住了7位文化名人，夏志清、李泽厚、莫言都是她的座上宾。她也经常回国，但上海却不是以前的模样。“我找到了吃饭，却丢失了味道，这是在我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，过去的味道，小时候的味道，我自己的味道……”这是章小东近来常说的一句话，也是《吃饭》结尾处的点睛之笔。“找到了吃饭”，是指她在坎坷中寻得了生存之道；“丢失了味道”是指对故乡面目全非的百感交集……

环球人物杂志：你的书有虚构吗？
章小东：大多数是我亲身经历的，少数是听说。我生活中最艰苦的阶段，一是“文革”，二就是到美国。《吃饭》就是讲这20多年是怎样走出来的。我出国前妈妈和我讲了许多话，叫我牢记你是爸爸的女儿，吃

饭要吃得有尊严，不能为了吃饭样样都去做。我在餐馆打工时，周末晚上的小费就有100多美金，但我如果跌进钞票这个洞里，我就没有今天。有人活着没目标，还有人活得没尊严，我看不起这种人。

环球人物杂志：你书里的人物几乎都是女性。

章小东：是啊。有人定位我是女性作家，我写的是女性的心灵，女人的故事。当时我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一点，写完《吃饭》，我才想，是啊，我是在写女性，从女人的眼睛看女人的故事，男人我不大写，以后可能会改变。

环球人物杂志：你多年旅美，回来后对上海以及整个中国的变化习惯吗？

章小东：我出去“饭碗”是寻到了，但回来发现味道没有了。我回国后吃的咸菜黄鱼汤、油面筋百叶，老早的味道都没有了。人也如此，老早的人寻不到了，人与人之间不再真诚。也正如刘再复先生在我书的序言中所说：“人毕竟是人，人的肚子害怕被饥饿所折磨，而人的脑子则害怕被空虚所盘踞。”

我对一些事情看不惯，还是要说的，比如在上海，我为了帮残疾的姐姐上车和出租司机吵了好几次架；再比如很想吃炸油条，但听说有地沟油，不敢吃。

但是，我有个原则，外国人不能骂我的祖国。如果他们骂，我是要发火的。这是我自己家，我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我可以批评自己家有什么问题，但我不能让你们外国人说。这也是种感情。

摘自2013年24期《环球人物》

筱文艳：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13.就这样戏剧性地走出了刘家大门
这个当初靠设赌台起家的刘老板，一听说输了他的钱，立即暴跳如雷，骂声不绝，抡起拳头劈面就打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妻子也得受过。筱文艳唱完戏回到家里，刘家夫妇又是一顿臭骂，责令她跪在丈夫身边。刘家把筱文艳的公公也叫来了，刘大麻子当着亲哥哥的面，愤怒地诉说着小夫妻的种种不是。

常言道“木头也有三分火性”，何况是人。陈国祥看到儿子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，看到媳妇罚跪在儿子一旁，觉得妹妹、妹夫太绝情，毕竟小夫妻已经为人父母，就是千错万错，也该手下留情，给个三分面子，也好让他们做人；再说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还是你们的亲哥哥呢。他铁青着脸，眼里冒着怒火，狠狠地瞪着刘木初夫妇，一手挽起儿媳，一手拉起儿子，冷冷地说：“输了你的钱，我赔！”说得干脆，掷地有声。

刘木初夫妇没有料到陈国祥一不道歉，二不求情，冷冷的一个“赔”字，充满对他们的蔑视，甚至还带着仇恨，分明是“不买账”的挑衅。刘木初气得七窍生烟，一拍桌子，骂出“忘恩负义”四个字；刘大麻子更是捶胸顿足，不迭声地喊着“滚！”“滚出去！”陈国祥二话不说，领着儿子媳妇转身就走，毫不犹豫，脖子挺得硬硬的。刘木初对着他们背影，说了句：“有种，不要回来。”陈国祥回了一句“嗯哪！”意思是“晓得”。

筱文艳就这样戏剧性地走出了刘家大门。是她公公身上那股维护做人尊严的力量和一种宁穷不受辱的品格，领她走出了刘家。她一生对公公充满感激之情。

尽管筱文艳走出了刘家，还来不及感受喜悦，就开始为丈夫的赌债担忧，心里反而沉沉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但拿什么还？这么大的一笔钱，一家人节衣缩食，东拼西凑，也难以还清。筱文艳虽然唱了四年戏，但是没有拿过工资，在刘家过的是“供给制”生活，自然没有积蓄，唯一值钱的只有手上的一只金戒指，重一钱八分，这是在结婚时，刘大麻子给她戴上的。事到如今，还戴什么金戒指，卖！



她把卖得的钱，交给公公还债！但她明白，这只戒指只是给她戴，没有说送给她，刘家随时可以收回。于是，筱文艳悄悄地从地摊上买了一只包金的线戒，戴在手上，天真地想来个瞒天过海。不过，还是给刘家发现了。筱文艳害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被刘家抓住把柄，又惹出是非来。因此急急忙忙地向小姐妹——淮剧演员筱翠花借了几件戏服，当了后又去买了一只同样的金戒指，才把这件事搪塞了过去。一卖一买，做了件蚀本生意，反而越帮越忙。

且说刘家，让他们夫妻“滚”只是一句气头上的话，想不到弄巧成拙，弄假成真，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。兄妹反目、两家失和，倒是没有好怕的，怕是怕失去了筱文艳，利益受损，让他们心存不甘。于是，私底下让亲朋友前去规劝筱文艳的公公，叫他向刘家赔个礼，让刘家有个“落场势”。再立一张契约，从今以后，筱文艳的丈夫就作为刘家的儿子，将来可以继承刘家的财产。如果不答应，刘家就关闭民乐大戏园。这是引诱，也是威胁，因为戏园一关，茶房做不成，也就断了你一家子的生活来源。夜，静悄悄。筱文艳的公公像泥塑木雕般地端坐着，说客们软硬兼施，一声高过一声地催着他表态。许久，陈家老爷子终于开口了，蹦出了两句话：“赔了钱，不赔礼！”“卖身契不写！”

果然，刘大麻子也说到做到，不再经营戏园了。但是，不是关闭，而是出租。
刘家把民乐大戏园租给了一个姓朱的。此人是浙江人，他的妻子是越剧名演员。从此，民乐大戏园就成了越剧场子。
其实，民乐大戏园的出租，是另有原因的。民乐戏园原来有三个股东，一个姓吕，一个姓季，另一个便是刘木初。开业之后，他们采取轮流使用的办法，第一年是由季家使用，第二年是由刘家使用，第三年由季家使用，不采取拆账分红制，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。这就要各显神通。姓季的不善经营，因此没有几年，就把股份卖给了刘家；姓吕的不久病亡，他的股份也卖给了刘家。因此，民乐戏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由刘家独家经营，赚了不少钱。

18.踏上了日本陶瓷重镇常滑的土地

海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能让袁朴生吐。它就是大，也没个边沿，恍恍惚惚袁朴生的梦境。开头两天的新鲜劲儿一过，袁朴生就不爱看了。头晕，反胃，吐。只能闭眼，在舱里煎熬地躺着。到了第十二天，袁朴生胃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吐了，勉强喝下的半碗盐水，也全倒了出来。空口般难受。古子樱比他能扛些，因为要回家了，像喝了鸡血。唱歌、手舞足蹈，可是到了第五天，脸也像张土纸了，瘟猪一样哼哼。但他的精神却像桅杆一样竖着，因为家越来越近了。早晨袁朴生被古子樱摇醒，说要去甲板上看出日出。两人搀扶着一出舱门就看到海水变成金黄色的了，不是之前见到的那种湛蓝、浅灰、浑黄，是真切切切金子一样的黄啊。被海浪烘托的旭日，害羞的处子似的，将面首慢慢探出平静的，绸缎一般光滑的海面，忽而嫩红，忽而金黄，将天地抹得宫殿一般瑰丽。袁朴生眼眶里突然涌满了泪水，一双弯弯的深眸在眼前闪现，水蓉，我与你真似天壤之别了。他喃喃自语。一旁的古子樱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，让袁朴生莫名其妙。想了一下，自己也又湿了眼眶。

第十六天，清晨，天下着细雨。长崎丸号海船拖着疲惫的船体慢慢靠岸。古子樱冲进舱门大声叫唤：师傅！师傅！到了！

远远地看去，那是一片灰蒙蒙的挨挨挤挤的房子。有许多烟囱在吐烟，天很灰。

这一天，光绪20年3月17日，袁朴生作为大清国的第一个民间紫砂艺人，踏上了日本陶瓷重镇常滑的土地。

最初的印象是，大片大片房屋的颜色晦暗，房顶和屋脊皆是黑白两色，走近一看，都是四角包着生锈的铁皮的木板房子。路边堆放着被废弃的陶罐之类。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，抬头看去，烟囱非常高，满耳是陶器碰撞的铿锵声。

恍惚回到了古蜀街。不过，古蜀街有蠡河，最终它会让人们安静下来。可是这里，连空气里都是嘈杂的。不远处的大海，奔腾而喧嚣，让人无法平静。那些烟囱，袁朴生更是看得眼花缭乱。

国壶

徐风



古子樱口气里掩不住自豪，说，师傅，常滑有400根烟囱呢，这里做陶的人可要比古蜀街多几十倍呢。袁朴生看了他一眼，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。看一看古子樱从清国带回多少东西啊？光是各种紫砂泥料，就满满的30个木箱子；还有几个大木箱，用铁皮包着，里面全是他当郎中时跟艺人们换的紫砂壶。

古子樱的家，坐落在常滑镇东南松寿山的西麓，一座带院墙的宅邸。是当地很气派的建筑。三岛家族是这里的望族，老三岛早年是当地的名匠，因为家族留下的陶业非常可观，他后来干脆弃医从陶了，按照古子樱的说法，那四百根烟囱里，有不少的数量都来自三岛家的投资。

第一天晚上，古子樱的三岛家族，以隆重的礼仪迎接了袁朴生的到来。在三岛家族待客的榻榻米上，袁朴生接受了老三岛敬上的三杯清酒。袁朴生觉得清酒很薄，有点酸，口感不太好。

古子樱换上了和服， he现在是三岛雄夫了。不过，袁朴生暂时还接受不了这个名字。他还是习惯地叫他子樱。古子樱把家族成员一一介绍给袁朴生：父亲三岛由纪夫，母亲千代子，妹妹三岛惠子。然后他指着榻榻米上的一个空位说，我太太美智子，因为她母亲生病，她回去看望，今天来不及赶回了。袁朴生向他们一一作揖行礼，分别赠送礼物。送给老三岛的，是一把老段泥仿鼓壶，器型简练，有一种古青铜器的质感。老三岛见了，先不用手去接，而是站起来，恭恭敬敬鞠了一个躬。说：贵国的紫砂壶，是国宝啊。

送给三岛老太太的，是一节磨出了包浆的紫砂如意。这是当年袁朴生在上海时，在一个博览会上捡的漏，应该是明代天启年间的东西。老太太不太懂，只知道这是个稀罕宝贝。老三岛却是识货的，一把夺过去左看右看，啧啧道：袁桑，这太贵重了，你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稀世珍宝给了我们？袁朴生答道：清国人的习惯，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朋友。古子樱把袁朴生的意思翻译成日文，大家齐声说：要西（好），要西（好）！古子樱又对袁朴生说，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你！